



中国古代文学

广播讲稿(1)

新疆广播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广播讲稿

(一)

新疆广播师范大学

一九八〇年三月

说 明

本书是我校语文专修科“中国古代文学”讲座的广播稿。

“中国古代文学”讲座由新疆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讲师张庄、刘兆云、秦绍培、郝延霖四位同志撰稿并讲授。

本书共分四册。第一分册是张庄同志编写的。付印前，我们在文字上作了适当修改。

新疆广播师范大学语文教研室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第一讲	导 论	(1)
第二讲	远古至战国文学概况	(7)
第三讲	中国古代神话的起源及演变	(16)
第四讲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点及其与 仙话、鬼话的区别	(24)
第五讲	中国古代寓言的产生及特点	(32)
第六讲	中国古代寓言作品选讲	(40)
第七讲	《诗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分类	(47)
第八讲	《国风》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57)
第九讲	《伐檀》、《硕鼠》讲解	(67)
第十讲	《诗经》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73)
第十一讲	“楚辞”与伟大诗人屈原	(81)
第十二讲	《离骚》分析	(88)
第十三讲	屈原的创作及影响	(96)
第十四讲	《孙子兵法》与《谋攻》	(102)
第十五讲	《左传》与《曹刿论战》	(109)
第十六讲	孔丘与《论语》	(115)
第十七讲	荀子与《劝学》	(122)
第十八讲	庄周与《庖丁解牛》	(130)
第十九讲	韩非与《扁鹊见蔡桓公》	(137)
第二十讲	墨子与《公输》	(143)
后 记		

第一讲 导 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从地下发掘证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生产上、文化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仰韶文化”（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后冈下层的“仰韶文化”（河南安阳后冈）、细石器文化以及南方文化等遗址的发现，都证明我国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是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国家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是我国悠久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千年来，我国产生了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历史学家、诗人、自然科学家。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象屈原、司马迁、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韩愈、柳宗元、辛弃疾、陆游、关汉卿、王实甫、曹雪芹等文学巨人，都如灿烂明星，在祖国历史上放射着异彩。在文学的种类方面，更是百花竞艳，有诗歌、辞赋、词曲、歌谣。有各种散文，如哲理的、历史的、抒情叙事的，以及骈文、杂论、奏议、书信、碑帖等不同文体。此外，还有各种戏剧和小说，如元杂剧、明传奇、六朝志怪、唐传奇、明清长短篇小说，等等。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正因为我们还是小学生，所以尤其需要学习。对于学习借鉴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古代文学，可以使我们了解悠久丰富的文学遗产的发展变化；了解古代文学与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了解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了解文学创作方法和技巧的发展变化，从而用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

为了批判继承古代文学遗产，作到古为今用，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学习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毛泽东同志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讲话》）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否则就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要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现代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新民主主义论》）由此可知，对古代文学抱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把古代文学、作家、流派放到应

有的历史地位去研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三，必须正确掌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但否定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定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讲话》）我们的政治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古代作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讲话》）标准虽然有了，但如何去掌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机械地搬用这些原则，而不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不深入分析历史上的不同情况在文学中的折光似的反映，不看一个作家的主要倾向以及形成这种倾向的复杂原因，那就可能得出形而上学的错误结论，从而把一些宝贵的文学遗产否定掉。

以上提到的三点，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学的基本原则。下面谈谈学习古代文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过程中，曾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始至终贯穿着现实主义文学和反现实主义文学的斗争，并且认为这种斗争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观点对不对？我们认为是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这是因为：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方法，不是什么创作规律。作家采用某种方法，取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自己的生活阅历。如果我们把一种创作方法看作文学创作的普遍现象甚至是一种文学发展的规律，把一部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史归结而为创作方法的斗争史，那显然要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并且也不可能概括文学发展的全部过程。例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显

然不能包括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至于所谓规律，它最起码的条件应该是能够反映整个文学发展运动的根本特点。然而，上述理论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一、二部文学发展史和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史、生产斗争史是紧密相连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必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在文学领域所呈现出的各种斗争，也必然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直接或简接的反映。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中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征服大自然的斗争和愿望，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情况。但是，这些斗争绝对不是用创作方法就可以概括的。在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文学流派或一种文体的出现，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总是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学本身的多种原因（其中也包括作家个人的因素）形成的，绝对不是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支配下产生的。例如，楚辞的产生，《红楼梦》的创作等，都是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作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创作方法影响历史，恰好是历史影响创作方法。

二、在六十年代初期，曾流行过人民文学和反人民文学的斗争构成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说法。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把中国古代作家不是划为人民文学家，就是划为反人民的文学家，非此即彼，使许多作家蒙受了不白之冤。对于这种理论，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文学发展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它的错误之处。大家知道，由于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属于一定的阶级，它必然反映一定的阶级意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性以及作家的不同生活道路而形成的差别。对这种现象，显然不能用划阶级的办法来区别进步与反动，区别人民作家和反人民作家，只

能针对具体作家作品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历史本来而目的结论。例如《庄子》一书所宣扬的虚无主义哲理，显然是应当扬弃的糟粕，但书中对当时社会黑暗现象的批判，对文学语言的提炼，对寓言的创作，却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宝库。鲁迅先生称赞这部书：“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对庄周这样的作家，能说他是反人民的吗？再如李煜的词，与人民显然没什么联系，他只不过真实地抒写了一个亡国之君的哀怨和对往日生活的留恋。然而，他用娴熟的创作技巧，非凡的才能，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词的表现力，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这样的作家，把他划成反人民的显然不能服人，说他是人民作家的确也未免牵强。那末，用上述理论来套，他到底应该算什么呢？还有，中国文学史上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以及像陶渊明、李清照等等，应该归到哪一类呢？总之，这种理论经不住实践的检验，在具体问题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当然，我们不同意这种理论，并不是要否认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和反人民文学这种现象的存在，我们不同意的只是不应该把这种现象说成是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更不同意用这样的概念来划分作家。

三、“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讲儒法斗争，鼓吹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妄图以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在这种谬论的影响下，一部中国文学史被套上了儒法斗争的框子，一些伟大的作家因为批评过秦始皇或没有对秦始皇唱过赞歌就被视为儒家，列入了“四人帮”的黑名单。如孟轲、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杜甫、韩愈、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等等。在“四人帮”的“横扫”下，中国古代文坛上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个被他们钦定的法家诗人或文学

家之外，其余已荡然无存。“四人帮”给古代文苑带来的空前浩劫，给千百年前的死人制造的文字冤狱，真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儒法斗争，本来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现象，并没有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硬把文学史纳入儒法斗争的框子，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思考题：

- 1、对古代文学应该怎样批判继承？
- 2、为什么说中国文学史并不是儒法斗争史？

第二讲 远古至战国文学概况

原始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种种复杂的现象，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想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神”。围绕“神”所构成的故事，就是神话。高尔基在《原始文学的意义》一文中说：

“一般来讲，神话是自然现象，是人们与自然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艺术概括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神话，是最古老的口头文学，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例如有对自然界日月星辰和风云雷雨进行解释的神话，有天地开辟的神话，有人类起源的神话，有对大自然进行斗争的神话，等等。这些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愿望和征服自然的决心，在艺术上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但是，中国神话并不像希腊神话那样系统和完整，而多是一些片断，保存在后来的《尚书》、《诗经》、《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以及诸子著作中。

据古笈记载，上古时代，除了人们口头创作的神话而外，还有歌谣。现保存下来的有《吴越春秋》中相传为黄帝时代的《弹歌》，有《礼记·郊特牲》中的《蜡辞》，《尚书·汤誓》中所记夏桀时的民谣。此外，《易经》中也有古歌谣的片断。收集古歌最多的专集要数《诗经拾遗》《玉海》。但由于古歌年代悠远，真伪混淆，读时要特别注意分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殷代出现了文字。（文字创于

何时，现无资料可考。）文字的出现，使我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即从口头进入书面创作的时期（当然，这种创作是极简单的）。殷代的文字，是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发现的。因为它刻在龟甲、牛骨上用作占卜，所以称为“甲骨文”或“卜辞”。这些文字记载了商朝从盘庚迁殷以后帝王打猎、出行、祭祀、征伐等活动。从现有的十万片左右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文字的结构，已具备了形声、会意等特点。由此推断，早在盘庚以前就应当有一种更古老的文字了，但迄今仍未发现。

此外，殷代的铜器也有铭文，类似甲骨文，一般记载赏赐的年月、原因等等。

甲骨文的出现，证明我国在进入奴隶社会后，整个文化较原始公社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它，我们还可以看到殷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此外，在甲骨文中还保存了个别韵文片断，使我们能见到古代诗歌的大略情况。总之，甲骨文、金文在历史上、文学史上的价值都是很大的。

继卜辞、金文之后，是西周文化。

公元前一〇六六年，周武王姬发会合南方许多小部落攻破了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消灭了殷朝政权，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在经济上还实行了井田制，大规模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从《诗经》周颂中的《噫嘻》所记“亦服尔耜，十千维耦”，以及《载芟》中所记的“千耦其耘”来看，都证明西周农业的发展的确是大规模的。在政治上，西周以周天子为宗祖，下面分封许多诸侯，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这种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文学上也呈现了崭新的局面。例如，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创作，以《尚书》为代表的政论、历史散文的出现，以及以《易经》为代表的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都证明西周文化已较殷代的巫文化有了很大进步。但是，西周毕竟是奴隶社会，它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千百万奴隶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上的。所以，随着西周的建立，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地发展着，特别是在夷、厉、共、宣、幽几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这一广阔的社会背景，为西周文学的代表作《诗经》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部古代诗歌选集在春秋中期的诞生，为中国古代文学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诗经》一书，是汉朝时才列为儒家经典的。作品包括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大部分诗歌创作，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选集。这部选集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雅”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创作；“颂”是最高统治者用作庙堂祭祀的乐歌。现存三〇五首诗，都可以入乐。《诗经》中的诗，成功地创造了赋、比、兴的表现方法，创造了许多优美、形象的词汇，为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西周的另一著作是《尚书》，又名《书经》。这部书分虞、夏、商、周四编，体裁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种。这些文献，是古代帝王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件的记录，也是西周最高统治者对历代兴亡的经验总结。它虽然文辞简单，但作为政治、历史散文的发端来看，在文学史、历史上的价值仍然是很大的。尤其可贵的是它保存了许多古代神话，使我们对远古文学有迹可寻。

《周易》，是一部西周时期占卜用的书。相传这部书的卦辞是周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西周人把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归之于阴阳变化，由此推演出了八卦。解释每卦的

辞叫“卦辞”。每一卦，又有不同的六个部分，叫“爻”，解释每一“爻”的辞，叫爻辞。这种把事物变化归之于客观存在的阴阳之变，是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周易》保存了一些古代歌谣、谚语，对于研究诗歌史、哲学史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献。

西周社会在公元前七七一年平王东迁洛邑时就进入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展开了剧烈的兼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剧烈。在社会经济方面，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富商大贾富甲王侯，如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学生子贡等。这种政治经济的变化，引起了奴隶主统治者文化独占权的下移，社会上出现了知识阶层。他们的出现，构成了各国世卿的政治力量。出生在公元前五五一年的孔丘，就是设立私学，广为传播文化知识的大师。春秋末年的墨翟，又是另一位设立私学的大师。学术空气大为活跃。儒墨两派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选定了自己的教材。私人著述也渐渐兴起。统治者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大量从事历史撰写工作，春秋中后期出现的所谓百国春秋，就是历史著作兴起的证明。在这些历史著作中，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孔丘修订过的鲁国的历史——《春秋》。这部书，包括了前七二二年至前四八一年间的鲁国历史。由于文字简单，意义隐晦，文学价值甚微。

由于阶级斗争的剧烈发展，春秋晚期，周王朝已处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之中。各级奴隶主政权渐次落入世卿家臣手中，如鲁国的季、叔、孟三氏，晋国的韩、赵、魏三氏，便是突出的例子。在周王朝政治崩溃的大动荡中，出现了地主阶级，并渐次登上政治舞台，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历史从此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的战国时代。这时诸侯兼并战争

愈演愈烈，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也随着自身的强大而日益展开。在孔子死后不久，各诸侯国相继进入了封建制的变革。如，前四二四年魏国李悝的变法，前六九一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前三八七年齐国田氏的政变，前三五九年和前三五〇年秦国商鞅的变法，前三一八年燕国子之的变革等等，都是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变法运动。由于各国相互兼并的结果，像春秋五霸一样，形成了七大强国，各怀野心，争雄逐鹿，把广大人民推入了战乱的空前浩劫中。就在这一尖锐斗争的背景上，造成了“士”阶层的活跃条件。统治者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养士之风大盛。战国初魏文侯礼贤下士，拜孔子的学生子贡为师。齐威王、齐宣王在都城临淄稷门修建高楼大厦，专供知识分子居住讲学，高级的还列为大夫，可以不治而议。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养士都在数千以上。由于统治者对士的重视，一时之间各种文士（知识分子）、武士乃至鸡鸣狗盗之士都大大活跃起来。许多士凭借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朝秦暮楚，奔走列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时的纵横之士苏秦、张仪就曾身居相位，提出合纵、连横两条路线，影响达半个世纪之久。社会上的士为了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对政治、经济、自然、人生的看法，展开自由辩论，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初司马谈把战国各流派分为六家，即：阴阳家、法家、道家、儒家、墨家、名家。（《史记·太史公自叙》）后来《汉书·艺文志》又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共成九派。在战国各派中，比较说来，构成独立思想体系的只有儒、道、法、墨四家。

儒家，是春秋末叶兴起的一个学术流派。它的创始人是孔

丘。其学说以“仁”为核心，主张“仁者爱人”（当然并非一切人），反对暴政，要求统治者实行礼治。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希望恢复西周的王制礼义，如说：“苟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在孔丘的学说中，无疑有许多落后的东西，如主张恢复西周礼治，主张克制自己，反对犯上作乱，轻视劳动，等等。但是，他广为传播文化知识，反对暴政，主张“有教无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儒家的主要著作，有《论语》、《孟子》、《荀子》。

《论语》是孔丘的学生编辑的语录、记事专集。这部书包括前期儒家的道德观、政治观、天道观、历史观、文学观、教育观等内容，也偶尔述及当时隐者的活动。语言深刻简炼，许多片断富于文学形象。例如《楚狂接舆》、《荷蓧丈人》、《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都写得极其生动。

在战国中期出现的《孟子》，是儒家散文的又一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文笔简炼，雄辩多姿，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孟子》七篇，据《史记》载，是孟子与其门人所作。这部书虽然主要是宣扬他的行仁义保民而王的思想，但在一些篇章中却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统治者剥削的残酷。例如《梁惠王》上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又例如对当时兼并战争的描写：“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一书中，除了继承孔丘的仁政思想，还发挥了民本主义，如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但是，他和孔丘一样，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地位永远不可变更，如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并把这种剥削关系说成是天经地

义的。总之，《孟子》一书在文学史上有着相当深远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荀子》也是研究战国中期的哲学、文学、政治的重要著作。荀况是一位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而又兼有法治思想的哲学家、政治家。他所著《荀子》三十二篇，在政论文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王制》、《天论》、《劝学》、《富国》等都被列为文学名篇。

此外，道、法、墨、名各家，在战国时代都是极有影响的学派，而且都有专著。

道家散文《庄子》，是庄周及其门人所著。全书三十三篇，几乎每一篇都用寓言进行说理，在晚周诸子的著作中，文学价值是最高的。庄周是一个有严重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的哲学家。他所宣扬的虚无主义，带有明显的没落阶级的烙印。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他从愤世嫉俗的感情出发，大胆地揭露统治者的虚伪，鞭挞人情世态的丑恶，使他的著作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如他的寓言《儒以诗礼发冢》《曹商使秦》《盗跖》等篇，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法家散文《商君书》、《韩非子》，集中地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尤其是《韩非子》，把前期法家的思想继承下来，集中为法、术、势的结合，从理论上阐明了法治的重要性、政权的决定性，为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文章明白畅晓，论证严密，用词犀利，为我国政论文树立了良好范例。

墨家散文《墨子》，据《汉书·艺文志》载是七十一篇，分十五卷，但现存的仅五十三篇。这部书是墨子及其门人先后写成的。它是墨家思想的总集。在这部总集中，除了宣扬兼爱、非攻的思想之外，还涉及到了自然科学、军事、逻辑学等方面。在文学史上，《墨子》是第一部有严密逻辑系统